

转战陕北胜利的根本:密切的党群关系

张秀丽¹,朱芸丽²

(1.延安大学 西安创新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2.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主动撤离延安前后的战略抉择,到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而不过黄河;从转战陕北期间制定的战略和决策,到各级干部深入基层,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从人民群众倾其全力帮助、掩护中共中央、毛泽东几次遇险,到支持西北野战军以蘑菇战声东击西,以少胜多。这些无一不体现出密切的党群关系,这正是党中央转战陕北胜利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党群关系;毛泽东;转战陕北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5-0017-06

面对国民党以25万大军从西、北、南进攻延安,而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2万多人,且弹药奇缺、装备极差的事实面前,该怎么办?毛泽东最终作出的抉择是主动撤离延安但绝不东渡黄河,留在陕北转战。做出这样的抉择,党中央、毛泽东是有足够底气、充满自信的,这一点从毛泽东撤离延安的第二天,打电报给彭德怀就可看出:“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毛泽东始终认为,“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1]177}在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的枣林沟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哪里最安全,人民拥护我们的地方最安全,我看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有保证。”^{[1]206}这既体现了毛泽东对陕北人民的深厚感情,同时,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充分信任。

一、转战陕北之前良好的党群关系是党中央作出转战陕北抉择的根本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根本路线。从1935年10月党中央落脚陕北,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之前,不仅在陕北而且在整个陕甘宁边区通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我党构建起来了坚实的党群关系,这一良好的党群关系在转战中得以充分验证。

1. 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党通过领导群众实现普遍、自由、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等民主原则,给选民以选举的法律保障,真正调动了群众选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群众在参与第三次选举后,非常满意地说“这次选举是瓜里头挑瓜,好人里挑好人”。^[2]其次,通过普选活动,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群众的普选活动是边区民众利益的集中体现,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政府工作人员普遍与群众相结合,经过耐心、仔细的宣传动员工作,普选就有了正确的政治保证。再次,有利于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使各级政府工作不断完善。

普遍的群众选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地。1938年7月初,毛泽东与赴延安考察的世界学联代表团进行了长谈,对于边区政权的民主建设表达出由衷的满意,他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3]人民群众通过参与民主政治建设,充分感受到当家做主的权利。

2. 战胜了财政经济困难,发展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首先,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普遍、扎实的精兵简

收稿日期:2021-05-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9JJD710013);延安大学科学研究项目(2018XJKY-7)。

作者简介:张秀丽(1966—),女,陕西榆林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延安十三年、思想政治教育。

政工作,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减少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最为明显的是公粮负担,边区征收公粮由 1941 年的 20 万石,减少到 1945 年的 12 万 4 千石。^[4]其他负担也相应有所减轻。经过精兵简政,不仅边区“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对坚持抗战,夺取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通过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群众抗战的力量。正如毛泽东于 1943 年所指出的:“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又更加迫切的……意义。”^[5]减租减息,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土地革命中的利益,缓和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最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更创造了奇迹。在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生产自救的效果逐渐显现出来,到 1943 年,大部分根据地都通过生产自救克服了财政困难,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和谐。

3. 满足了群众对文化的需要,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健康发展

实行普遍的群众教育和文艺工作,首先是降低了边区成年人的文盲率。许多成人由不识字到识字,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能够看书读报,有的还学会了写信。在陕甘宁边区的第二届参议会上,一份关于对边区人民文化程度的估计的提案认为:在实行普遍的群众教育之后,全边区 13 岁至 50 岁的文盲人数比未受教育前降低了 7%。^[6]在边区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二是通过社会教育起到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作用。边区当时有大众黑板报,通过黑板报发表自己的言论,有些地方通过黑板报扬善贬恶,从中教育群众。黑板报也可以是光荣榜,常常对好人好事、劳动模范进行表扬。一块小小的黑板报,在当时经济文化条件较差的边区,起到很大的教育效用。^[7]

一系列群众广泛参与文化工作搭建起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之间、边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这不仅为当时经济物质困难的边区增添了无限的精神食粮,推动着边区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为鼓舞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成为我

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对新时代文化工作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可见,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伟大实践,奠定了转战陕北的坚实的群众基础,使毛泽东毅然作出转战陕北的抉择。创造了运筹帷幄于山崩沟壑之间,决胜千里于江河湖海之外的奇迹,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二、转战陕北期间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升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1. 推进土地改革,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转战陕北期间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彻底解决解放区农民的土地问题。在“五四指示”的基础上,1947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13 日,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同年 9 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 月 10 日,党中央公布正式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以解决目前存在的土地问题,该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8]同时,对于如何平分土地,也制定了相应的原则。随即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土改轰轰烈烈地在各个解放区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但是在土改工作进行中,由于一些干部对于政策和纲领性文件的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工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因此诱发其他矛盾产生。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土地改革是非常有成效的,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几个重要问题,但不是土改的全部问题。主要有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民阶级;二是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三是关于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四是对工商业的政策;五是关于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的问题;六是某些地区打人杀人事件现象的发生。

以上这些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同样存在,为正确贯彻落实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与精神,1947 年 11 月,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各地委及边区一级机关干部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人员有:贺龙、习仲勋、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等,由贺龙致此次会议开幕词,习仲勋作会议总结发言。^[9]³²³会上重点纠正过去土改中各部门存在的问题及干部的思想作风与阶级立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彻底“翻底子”。会议作出了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定。

这次会议推动了边区土改工作的开展,同时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也得到改进。对于在土改工作过程中出现工作错误的党员干部,在进行党内教育之外,鼓励进行群众教育,让群众指出其工作失误并进行批评教育。1948年8月4日,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习仲勋讲到义合会议时说,义合会议的召开,不仅许多官僚主义作风被打掉了,而且各地领导的工作作风也转变了,改变了以往强迫命令的作风,能够严肃地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倾向。^{[9]324}在土改中,我们的绝大部分党员干部对待工作能够公平公正,不以权谋私,但是不乏一小部分干部由于思想认识不足等破坏政策,在土改中出现了“左”倾错误和过激行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西北局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时,了解到贫民团将一个地主老婆吊打的情况后,当晚召开了当地干部和贫民团负责人会议,亲自向他们讲解党的政策,帮助改正错误。

转战陕北期间成功的土地改革,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对转战陕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极大的作用。也使国民党惊恐万分,1948年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惊呼:“土地改革的成功,也是‘叛乱的成功’”。^{[9]325}

2. 新式整军,严明军纪,巩固军民鱼水关系

在西北野战军对国民党军连续的“三战三捷”和具有扭转西北战争局势的“沙家店战役”之后,解放军的队伍得到了扩充。但是由于新扩军人员绝大多数为国民党军的俘虏兵,这些士兵由于长期接受国民党军对其进行的军事和政治教育,对我们的军队认识存在严重的偏差;此外,国民党军自身军纪不严,士兵大多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与我军的纪律严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的发挥,尤其体现在两次进攻榆林的失败中。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调动军队的整体积极性,发挥俘虏的战斗力的战斗力,以彭德怀为主的中央领导人决定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冬至1948年夏,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整军运动开展起来,从“充分动员酝酿,提高诉苦自觉性”到“发现与培养受剥削压迫最深的诉苦典型,启发引导全体官兵认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及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再到“全面诉苦运动的展开”,直到最后的“挖苦根”,一步步深挖苦根,然后在各部队进行

“查阶级、查斗志、查工作”的阶级教育,力求从思想和组织上整顿人民军队。

通过新式整军,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觉悟大大提高,明确了广大指战员和战士为人民而战的目 标,增强了官民和军民的关系。对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说道:“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10]291}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西北野战军严格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动准则。对于国共截然不同的军纪,有群众曾拿国共两党军队对待枣树的态度做过对比:“面对同一棵树,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严格贯彻军纪,不摘不拿一颗枣;国民党的部队走过,别说枣了,连树枝都没有了。”^{[11]226}在当时的年代,不论官职大小都须遵守纪律。党中央转战途经延川刘家渠时,毛泽东曾问当地的老乡借了几个土豆,并坚持给了老乡钱。面对老乡的拒绝时,毛泽东对老乡说:您不接受我的钱,您这是要我犯“纪律”呀。^{[11]234}转战沙家店途中,有一次警卫员为了让疲惫的毛泽东得到很好的休息,私自打开了躲避战乱不在家的老乡家门,尽管主席当时已很是疲惫,但是他决然地拒绝了警卫员。毛主席认为,即便是在战乱中,也要遵守纪律,不然就是违反纪律。^{[11]234}虽然是一些细小的事情,但充分表明共产党军队铁的纪律和对群众财产的爱护。

3. 西北野战军“蘑菇”战术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出延安后,面对国民党军34个旅20多万人的进攻,仅有4个野战旅、3个地方旅,2万多人的军队,在彭德怀、习仲勋的领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抓住胡宗南部仗其兵力优势急于与我军决战的心理,利用陕北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坚固的群众基础,采用“蘑菇”战术,诱敌深入找准时机一举歼灭。西北野战军以小部队为“磨心”,将胡宗南的部队吸引到山崩沟壑中与其周旋,消磨敌人的意志,饿困敌人,使其焦躁不安,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然后伺机歼灭。以“打和磨、磨和打”结合的“蘑菇”战术,有力地阻击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军事进攻。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在致西北野战军的电报《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敌人现在已经相当疲劳,他们为了歼灭我们,“不顾疲劳缺粮,将我军主力

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那我们就“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在这个过程中,“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战术叫“蘑菇”战术,将敌人磨得疲劳不堪、孤立无援,然后消灭之。^{[10]1222}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巧妙运用“蘑菇”战术,牵着国民党军在延安周边周旋,时而向南时而向北,忽而向东忽而向西,把敌军拖得疲惫不堪。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高瞻远瞩,为了保护主力部队,迷惑敌人,布置了“青化砭战役”。随后的“羊马河”伏击战和“蟠龙镇”攻坚战,这三次战役,三战三捷,共歼灭敌人 1.5 万人,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成功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撤离延安的任务。

这些胜利的取得,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说过,敌人看似军队人员数目庞大,力量雄厚,但他们忽略了来自人民的强大力量。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西北各地的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边区 160 多万群众都动员起来,为了洞悉敌人的一举一动,他们自发地积极为野战军做向导、传递消息、站岗放哨,暗地里帮助军队运送军需物资、转移救治伤病员,而面对敌人的盘查询问守口如瓶;群众自发自觉地保守和掩护党中央的安全和中央支队的行踪,致使敌人失去寻找目标。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尽管党中央领导的军队在人力、财力、物力上远不及国民党军,但是他们取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得到了群众的支持,群众自发自愿地与党中央共渡难关,为取得战争的胜利作贡献。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讲:“据 1947 年 3 月至 1948 年 2 月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 218.2 万人次,支援牲畜 147.8 万头,做军鞋 92.8 万双,筹送粮食 120 万石,柴草 1.2 亿斤,动员 4.2 万青年参了军。”^[12]

三、转战陕北党群关系的现实启示

1947 年蒋介石要求驻扎在西北的胡宗南部对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面对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党中央、毛泽东被迫作出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的决定。从 1947 年 3 月 18 日至

1948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足迹遍布陕北 12 个县,38 个村,总的行程达 2 000 多华里。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尽管屡次遇险,但毛泽东对转战陕北始终充满自信,底气十足。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我们党与群众建立起的密切关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们看到的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11]1228}“没有陕北群众的支持,没有干部战士的前赴后继,2.5 万人怎能打败 25 万强敌呢?”,^[13]可见,密切的党群关系是转战陕北胜利的基础,探索这一时期密切的党群关系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1. 越是困难,越要为群众着想,敢于担当

党的十九大强调:“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敢于担当,是我们党先进、优秀的重要体现和保证,目前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遇到的困难前所未有的,我们要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要勇挑重担,积极作为,把主动担当、善于担当贯穿于我们事业的全过程。精准把握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扭住改革发展“牛鼻子”,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和突破口,持续用力。转战陕北时,党中央、毛泽东在最为困难的时期,是留在陕北转战还是东渡黄河转移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丝毫的犹豫,始终坚持留在陕北,和群众一道同呼吸共患难,让老百姓感受到共产党心里装着老百姓。这种在困难面前,想着群众安危、敢于担当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勇气。胡乔木说:“这是一个转机。陕北人民感到毛主席与人民是联系在一起。”^{[14]60}这种血肉联系是转战陕北胜利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2. 任何时候都要“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群众利益无小事。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心用力”专心致志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为群众谋利益,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14]102}转战陕北期间,尽管党中央

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主动撤离延安,但为了鼓舞人民士气,坚持转战在陕北,不过黄河,始终与老百姓紧密团结在一起,不分开。转战期间,党中央也没有忘记为人民群众谋取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实际利益。为了推动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获得推翻国民党反动力量的群众基础,党中央于1947年颁布并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损害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旧土地制度,推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土地制度。随之土改在各个解放区有条不紊地推行开来,由此,人民群众义无反顾,保护党中央毛泽东,支前的热情空前高涨。

3. 始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

习近平同志讲,“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14]¹⁵¹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组织者、管理者、推动者,是作风建设的风向标和指示灯。要切实增强群众观念,真心热爱群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实情、体察民情、汲取智慧、获取力量,尽最大责任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尽最大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广大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加紧为前线部队筹集军需物资,另一方面也要维护群众安全;为了避免群众利益受到损害,党员干部提前安排组织撤离并转移可用的人员和物资,以免遭到国民党军的迫害;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党中央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村里和群众交流,了解群众的需求,同时也从侧面了解部队的情况,有没有违反纪律的。在当前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干部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群众办实事,与人民群众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带领人民群众振兴乡村。

4. 净化党内风气,转变干部作风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加强自身建设的显著特点,它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兴衰成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时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在战争年代,陕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因素,尽管条件十分艰苦,物资极度匮乏,一度曾到了没有衣穿、吃不饱饭的境地,但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依旧清明廉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以权谋私。反观当下,我们也要看到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党内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还很严重,这直接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的发展。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里,是陕北人民群众用小米粥哺育了党、壮大了党。在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一年零五天中,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论是上至毛泽东、习仲勋这样的中央高层领导干部,还是下至基层干部,都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鱼水关系”。正是这种“鱼水关系”的建立,为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深厚的人力物力资源。

人民群众是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转战陕北期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掩护,中共中央、毛泽东几次遇险何以转危为安?何以取得一次次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指出:“要民众,虽有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0]²⁰²这也是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自信之源。今天,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针对党内存在脱离群众、党群关系面临挑战的问题,习近平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讲政治、敢担当、转作风”,所以,要发扬延安精神,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改进党的作风,适时净化党内风气,努力建立与转战陕北期间那样一种密切和谐的党群关系。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77.
- [2] 张建儒, 杨建. 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92.
- [3] 李世明. 延安精神[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83.
- [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陕西省档案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7编 互助合作[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152.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910.
- [6]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 上[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268.
- [7] 田真. 探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黑板报——以1941—1946年《解放日报》为视角[J]. 新闻研究导刊, 2017, 8(18): 54-55.
- [8] 张卫波. 实现耕者有其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4: 86.

- [9] 任学岭,谭虎娃.陕甘宁边区史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高凤林.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党群关系口述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2] 刘卫平.红色延安口述历史——转战陕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 [13] 马航.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历史解析[N].榆林日报,2017-03-18(1).
- [14]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The Fundamental of the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Northern Shaanxi: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ZHANG Xiuli¹, ZHU Yunli²

(1. Xi'an Innovation College, Yan'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victo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Mao Zedong's transfer to Northern Shaanxi is the victory of the Party-group relations. From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Mao Zedong made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Yan'an to Mao Zedong insisted on staying in Northern Shaanxi but not cross the Yellow River; From the strategies and decisions made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northern Shaanxi, to cadres at all levels going deep into the grass-roots to solv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or the masses; From the people pouring their full help to cove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save Mao Zedong several times in danger, to support the Northwest Field Army to fight eastwards with mushroom warfare, with less to win more. All these reflec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victory of the Central Party's transition to the north of Shaanxi.

Key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Mao Zedong; transfer to Northern Shaanxi

(责任编辑:陆 勇)